

# 浅析档案编研在社会记忆功能建构中的作用

■ 汪俊 张敏 谢奇爱

**摘要** 本文引入社会记忆理论,阐释档案编研的社会记忆属性,并探讨其记忆建构功能。

**关键词** 档案编研 社会记忆 社会记忆建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后现代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历史观由“阶级斗争史观”、“王朝体系史观”演进为以人为本的“全球历史观”与“社会史观”,传统历史研究中对宏观大事、帝王将相的研究扩大为对日常生活、妇女孩童、底层人物、突发事件等微观层面的研究。历史观的演进,必将对现代档案观的确立产生深远的影响<sup>[1]</sup>。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档案记忆观”应运而生,成为继“档案文件观”、“档案信息观”与“档案知识观”之后的又一重要概念。社会记忆视角下的档案学研究更是方兴未艾,本文试图探讨档案编研的社会记忆属性及其建构功能。

## 一、社会记忆理论的提出

记忆(memory)一词最早起源于古希腊神话记忆女神的名字。在《大英百科全书》中,对记忆的解释可以归纳为四种:记忆中对过去事物的意象和印象;对所学习和经历事物回想或重视的能力或过程;进行记忆的状态或事实;保存释放信息的计算机装置或组成部分。《辞海》中解释为记忆是人们对经验的识记、保持、应用过程,对信息的选择、编码、存储和提取过程。李伯聪在《选择与建构》一书中指出:“所谓记忆,首先指的是信息存储过程。……还有一点应该强调指出的是:提取过程不是存储器中信息的单纯恢复或再现的过程,而是一个重建或建构的过程。<sup>[2]</sup>”由此可见,记忆不仅是一个信息存储过程,而且是一个选择和建构的过程。

“社会记忆”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的“集体记忆”演变而来的。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用于研究在家庭、宗教群体和社会阶级环境中,过去是如何被记住的。《论集体记忆》一书中指出:“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记忆的集体框架也不是

依循个体记忆的简单加总原则而建构起来的,记忆是根据现在的观念、需要和利益对过去进行遗忘与再现的主观建构活动<sup>[3]</sup>。”美国的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在接受“集体记忆”理论的基础上,将“社会记忆”概念引入了社会学,他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详述了什么是社会记忆,社会如何记忆的问题。社会记忆的提出颠覆了传统记忆观,认为记忆是社会建构的过程和结果,而不仅仅是机械地对所获信息进行编码、储存和提取<sup>[4]</sup>。社会记忆的深层内涵是人类的社会实践能力和本质力量对象化结果的凝结、积淀和破译、复活的双向活动,是实践主体对历史进行确认、保存、占有、延续的内在机制<sup>[5]</sup>。

## 二、档案编研的社会记忆属性

莫里斯·哈布瓦赫指出,过去是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也就是说,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取决于当时的愿望、利益、信仰、兴趣等,并由此重构记忆。阿莱达·阿斯曼在《回忆有多真实》一文中对回忆的真实性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sup>[6]</sup>。曹喜琛在《档案文献编纂学》中指出:“一部汇编从选题、选材、加工、编排到注释、加按、作序等各个环节,都必然会体现出编者的政治观点和思想倾向性。”在编研过程中,编纂者根据当时社会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和他自己的价值取向、利益关系选取符合要求的材料。台湾学者王明珂认为文字史料不能简单地视为“客观史实”的载体,而是人们各种主观情感、偏见以及社会权利关系下的社会记忆产物<sup>[7]</sup>。由此可见,档案编研是有目的、有意识的社会记忆建构行为。束之高阁的档案不能发挥记忆建构的功能,档案信息必须经过深层挖掘才能被社会公众所熟识,档案正是构建这一功能的最好手段。

## 三、档案编研的社会记忆建构功能

### 1.档案编研具有传递、整合社会记忆的功能

“档案是机关、组织和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保存备查的文字、图表、声像及其他各种方式和载体的历史记录。<sup>[8]</sup>”因其产生在时间上的阶段性,形成的分散性,并且在产生和保存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封闭性,必须对这些零散而庞杂

的档案进行编研，整合其中的信息资源，促进社会记忆的完整和深化。从文化发展史来看，一些重大的文化创造无不与档案编研有着密切的联系。孔子集商周档案之大成，编纂了《六经》，传承并整合了当时社会的思想，建立了完整的儒家学说体系，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石。先秦孔子，汉代刘向、刘歆父子，西汉的司马迁，东汉的班固，唐代的刘知几，宋代的司马光，清代章学诚等的文献编纂成果，为后人研究历史、记忆过去、传承中华传统文脉奠定了基础。譬如《资治通鉴》整合了 16 朝 1363 年的历史，司马光从“简牍盈积，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搜集、整理、鉴别、选用准确可靠的史料进行编纂，“择善而从，兼收并蓄”，广泛地选取杂史、小说等史料，“宁失于繁，勿失于略。”其内容丰富而深邃，给我们完整地再现和记忆了那段历史<sup>[9]</sup>。

## 2. 档案编研具有选择、强化优秀社会记忆的功能

莫里斯·哈布瓦赫指出：一向被我们认为是相当“个人的”记忆，事实上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行为。一个社会组织或群体，如家庭、家族、民族、国家等，都有其集体记忆并以凝聚人群，而档案编研则具有选择并强化这一记忆的功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和辛亥革命百年，全国各省、地、市档案局及历史专家以此为契机，充分利用馆藏资源，编撰一批具有地方特色和教育意义的作品。作为革命圣地的浙江省嘉兴市深入挖掘重大党史事件资料，编研出版了《红色印记——嘉兴革命历史遗址遗迹图鉴》和《中共嘉兴历史 90 年纪事》；辽宁省鞍山市档案局联合市委组织部编辑出版画册《鞍山红色记忆》。此外，还有很多的历史文献纪录片，比较形象直观地引领我们回顾了这段特殊的历史。如《伟大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是一部反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党史宣传资料，《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收录研究著作 30 种，34 分册，总计约 1400 万字。内容涉及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商人、商团和商会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精英文化研究等。

## 3. 档案编研具有补正社会记忆的缺失和偏差功能

人们的记忆往往是不完整、不系统的，并且记忆总是伴

随着忘却。怎样使人们真实地记忆过去并传承未来，档案编研是很好的解决措施。档案编研可以广泛收集社会上留存的资料，通过深度挖掘，使尘封的人物和事件鲜活起来，填补记忆的空白和缺失。例如，人们以前对清朝的记忆主要来自影视和野史传说，很多都是歪曲事实真相的，随着 1000 多万件大内秘档的公开，特别是档案文献纪录片《清宫秘档》的播出，使很多清史谜团大白天下。金铁木导演的历史纪录片《圆明园》根据清宫档案记录和绘画，运用数字化技术，把从 1707 年建园到 1860 年英法联军毁园的历史全过程逼真地显现出来，将圆明园这座惊艳绝伦的“万园之园”呈现在观众眼前，还世人一个“真实的”圆明园。

可见，档案编研在社会记忆的建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档案工作者要以“珍藏社会记忆、保护文化遗产、弘扬社会文化”为目标，以“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替未来着想”为宗旨，通过各种途径发挥档案的社会记忆建构功能。

### 参考文献：

- [1]薛匡勇.历史观演变对档案观的影响[J].军事历史研究.2010 年增刊 24- 27.
- [2]李伯聪.选择与建构[M].科技出版社 2008 年.
- [3]莫里斯·哈布瓦赫(法).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 [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 [4]保罗·康纳顿(美).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 [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 [5]丁华东.社会记忆建构：档案文献编纂社会功能的新阐释[J].北京档案.2008 (04) 38- 40.
- [6]哈拉尔德·韦尔策(德).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7]孙德忠.重视开展社会记忆问题研究[J].哲学动态,2003,(03):17- 21.
- [8]冯惠玲.档案管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版,第 3 页.
- [9]曹喜琛.档案文献编纂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合肥学院